

《史原》憶往

——林富士教授學思訪談



林富士（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）口述
傅揚（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）整理

在歷史研究的門牆之前

現在資訊科技發達，訊息豐富，大家可以透過各種管道認識大學系所。但我當年（1978）聯考填志願時，沒有人輔導，也不清楚大學和各科系究竟是怎麼回事。我高三才從自然組（分甲、丙二組）轉社會組（分乙、丁二組），除乙組的文史科系外，也可以選填丁組的法商類志願。我自認為對哲學、文學、新聞、法律都有興趣，無特定目標，最後選擇乙組，放榜時是考取臺大哲學系。不過，因為一些奇妙的因緣，在入學前就改分發進了臺大歷史系。

當時其實不甚明白讀歷史要做什麼，系裡的老師也不講，我就隨意過著有點瀟灑與頹唐的日子。一直到大三、大四，我仍然沒有確定要走哪一條路。我知道自己的家庭大概無法供養我出國深造，我能選的只有兩條路：就業，或是考研究所。最後便有些糊里糊塗的去考，錄取後，先去當兵，役畢後再回到臺大念書。

大學時，我並不十分清楚什麼是「研究」，但我很愛念書。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求知慾很強，但我閱讀時經常廢寢忘食，容易過度，從小學便如此。我喜歡讀各種東

西，不為什麼而讀。說老實話，我那時的世界相當狹隘，參與的活動多為詩社、文學性或社會性格強烈（即搞活動）的社群，跟歷史研究沒有太大的關係。

我大學時擔任歷史系學會的會長，也是社會性大過學術性。當時我推動了許多活動，如辦《史系導報》，從採訪、寫稿、排版、拉廣告，到跑印刷廠和準時出刊，都由學生自己處理。我也規劃迎新和送舊活動，並邀請鹿橋（1919-2002，《未央歌》作者）、余英時、許倬雲、林毓生、張灝（以上四位為中研院院士）、逢耀東（1933-2006，臺大歷史系教授退休）等先生來系上演講。我也是在會長任內，第一次知道《史原》的存在。我大三擔任會長時（1980年9月-1981年6月），許雪姬學姊（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）正在辦《史原》，要透過學會，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補助。《史原》雖是研究生刊物，但經費似乎必須透過大學部的學會申請。大學部的刊物則是《史繹》，我們上一屆學會沒有出刊，我便和幾位同學一起努力，將兩期的內容合併出版，因此，當期（17期）的《史繹》分量不小，篇幅較多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沒有非做歷史學家不可的想法，老師們也沒有特別鼓勵我們應該做什麼。

直到碩二上學期（1986年秋天），我仍

* 篇首林富士老師素描圖為師母倪曉容女士所繪。



有些舉棋不定，連指導教授都還沒找好，甚至還到《聯合文學》應徵，也去面試了。但那份工作是專職，而我當時仍在修課，他們有些為難，我便介紹彭明輝先生（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）去。我當時如果進入《聯合文學》，今天很有可能就在文學界了。無論如何，我斷了這念頭後，便埋頭讀書寫論文，開始專心做「研究」了。

學習做研究

我很喜歡讀書，也從學生時代養成寫作的習慣。即使如此，寫論文對我而言，仍是辛苦的事。通常在提出問題、閱讀史料、擬定寫作綱目之後，我腦海中已有全文大致的圖像，但要把它們寫出來，卻是一種耗神、耗力的苦差事，坦白說我不是很喜歡。

大學時修徐泓老師（東吳大學教授）的「明史」，老師要求我們讀學術論文並撰寫摘要。早年的期刊論文不像今天要求作者提供文章摘要。徐泓老師指定我們閱讀明史的論文，每一篇寫一份數百字的摘要。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練習，不僅學習歸納重點、寫摘要，也強迫自己看教科書以外的東西，特別是去認識所謂的學術論文到底是什麼。

大二時（1979年9月-1980年6月）因為要寫論文（學期報告），我開始學會使用研究圖書館（研圖）、期刊和書目文獻。當時大學生還很少到研圖。我最早投入研究的是黃宗義的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陸續又接觸《明儒學案》，選修遼耀東老師的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，並閱讀余英時先生的著作。因為有這些基礎，大四（1981年9月-1982年6月）修黃俊傑老師（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

究院院長）「史學方法論」課程，我便以「北宋理學家看不看佛書」為題，撰寫學期報告。這份報告以北宋的理學家為對象，提出了一個可說是相當天真（naive）的問題：他們讀不讀佛書？進一步問，佛教究竟透過什麼方式「影響」理學？應如何理解這種「影響」？同樣被歸類為理學家的一批人，對佛教經典與義理的掌握，以及他們與佛教徒的交遊，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？對此，我一本本地考察當時學者的傳記和語錄，最後成果〈從北宋理學家看不看佛書談起〉發表在《史繹》（第18期〔1982〕，頁3-51）。

進入研究所後，我課修得不多，但都相當認真。我修的課，老師都要求寫學期報告，而我對學期報告的寫作要求極高，都以能正式發表為導向，我許多已發表的論文其實便是脫胎於學期報告。

我想，我的研究無形中走的是史語所的路子，即重視鋪天蓋地蒐羅、掌握史料，而這種窮盡式的治學方法，需要長時間積累才能看到成果。我大概從大三起便養成習慣，每天一早就到文學院圖書館佔位置，泡在裡頭讀書。例如我做秦漢史，便把秦漢時期的文獻、考古報告一部部從頭讀到尾（至少也翻閱一遍），並做了相當多的卡片。這種窮盡式的讀書和學習，可以讓人對那個時代的社會全貌有較清楚的把握，給自己信心。關於秦漢史的任何問題或著作，即便沒有專門研究過，我仍有基本的對話與評價能力。讀研究所時，劉景輝老師（臺大歷史系退休教授）建議我到中國歷史學會發表論文。我便提了一篇文長約五、六萬字的論文：〈漢代



《史原》憶往——林富士教授學思訪談

的疾病觀念)，幾乎用盡當時所能見到的兩漢時期材料，當時有一位治秦漢史的老師看到，還很好奇的問我如何找出那些材料。在過去尚無漢籍電子資料庫的時代，我能全面性地蒐羅材料，可能給一些老師留下了不錯的印象，似乎也因此順利找到指導教授。

臺大研究生生活

我在服兵役時(1982年7月10日-1984年5月24日)，已確定碩士論文題目，目標和自己要做什麼都很清楚，常覺得時間根本不夠用。因此，我念研究所時(1984年9月-1987年6月)較少參與其他活動。但大體而言，當時系上研究生之間的感情不錯，除了一同修課，還分享了研究室的空間。當時是男、女生各一間，二、三個人共用一張大桌子。我們常常在研究室中一起讀書、談論，也會互相邀約出去吃飯、打撞球等等。

相較之下，師生的互動多在課堂上，私底下少有往來。比較特別的是和杜正勝老師(中研院院士)讀《左傳》的事。當時得知杜先生對《左傳》有精闢研究和獨到見解，我便和王健文學長(成大歷史系教授)及同

班同學李貞德(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)一起向杜先生提出請求，希望能跟隨他讀《左傳》。杜先生答應了，完全義務性質，分文不取。這不是正式課程，我們三人每周利用一個晚上，坐一小時左右的公車到中研院史語所舊大樓，點讀《十三經注疏》本的《左傳》，提出自己的心得，杜先生則聽我們討論，並給予意見。今天看來，此事仍是十分難得的因緣。許多年後，我在史語所義務帶領幾位臺大碩、博士班的學弟讀《真誥》，便是為了答謝當年杜先生的恩義。

我們之所以認識杜先生，是因為他當時在臺大有開課。事實上，這是當時歷史系課程方面一個不小的轉變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蔣孝瑀先生(臺大歷史系退休教授)做所長之後，便大量聘請中研院及各方人士到臺大授課。在那之前，臺大歷史研究所的課很少。而且，副教授如蕭璠先生(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退休)等，只能開外系「中國通史」、「中國現代史」這一類的共同科課程，無法開設所內的專業課。蔣孝瑀先生帶來了改變，我們的修課選擇一下子變得非常多，



▲與家人於臺大文學院前合影
(臺大歷史系碩士班畢業，1987年6月)



▲二十周年臺大歷史系同學會，前排左一為
林教授夫人倪曉容老師。(2003年1月18日)



我也是那時候才認識杜先生等校外老師。聽了杜先生的課後，我感覺他的研究路數與自己接近，於是在碩二時，鼓起勇氣請他與韓復智老師（臺大歷史系退休教授）一起指導我的碩士論文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碩三（1986年9月-1987年6月）曾到史語所打工。當時我同學李貞德已拿到碩士學位，並在史語所擔任助理，我則和已進入博士班的王健文學長到史語所參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典籍數位化工作，擔任校對，頂頭上司是蕭璦先生和劉錚雲先生（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圖書館主任）。我是到了那個時候，才真正認識什麼是中研院、什麼是史語所。更奇妙的是，我目前辦公的副所長室，竟然就是我當年和王健文學長一起埋頭校對的助理工作室。

《史原》憶往

我在《史原》發表了兩篇文章：〈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「癘」與「定殺」〉（第15期〔1986〕，頁1-38）和〈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〉（第16期〔1987〕，頁29-53）。

當年《史原》的稿源，許多是學生的課堂報告。授課老師認為不錯，就鼓勵同學，甚至直接拿去投稿。或是與主編認識，因為主編的邀稿而發表，我在《史原》發表的第二篇文章，就是王健文學長當主編時向我邀稿的。我記得我還曾「攔截」了一篇稿子！我修王德毅老師（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）的「宋史專題」，期末報告寫有關歐陽修《新五代史》的研究。學期結束之後，有一天王老師在文學院碰到我，突然跟我說：「富士

啊，你那篇報告我拿去給《史原》發表了！」我趕緊找主編把稿子拿回來。宋史不是我的專業，我不想發表一篇以後會讓自己後悔的文章。但對於王老師的厚愛與鼓勵，至今仍感念不已。

《史原》稿件多來自課堂報告，可以從第17期的情況略見一斑。該期刊登了4篇研究睡虎地秦簡的論文，並有韓復智先生所撰的〈研究報告引言〉。我也在韓老師研讀秦簡的班上，但我的文章已於第15期先行刊出，主題和其他人亦有些不同。當時秦簡雖經初步整理，大陸學者的研究報告仍未完全發表，還是十分引人矚目的新材料（猶記當時我所能讀到的《日書》，還是向史語所邢義田先生借的）。除了在材料上有先天優勢的大陸外，日本學界也才剛啟動睡虎地秦簡的研究。臺灣有優良的漢簡研究傳統，很快便掌握了新出的材料，當時有了包括睡虎地和馬王堆的新材料，上古史領域發展得頗快。而由於睡虎地秦簡的材料多為法律文書，當時討論的重心自然環繞法制史，這點也可從《史原》刊登的論文中看出。

我發表的論文則可歸類為宗教史、醫療史。首先，我在當兵時便準備做宗教史，讀秦簡時注意到「癘」與「定殺」，忍不住想追問它們到底是什麼？追下去便連結到宗教與醫療的課題了。選擇這個課題是非常自然的，因為這是我長期感興趣的東西。再者，睡虎地秦簡固然是熱門的新材料，但我不喜歡做學問是靠孤本秘笈取勝，研讀簡牘也與自己的才性不甚相合。我不喜歡文獻整理的工作，而想做較寬廣的課題。對我而



《史原》憶往——林富士教授學思訪談



▲林富士老師發表學術演講，講題為「臺灣童乩的面貌」。(2011年9月)

言，這些材料的重要性在於幫助我認識那個時代，解答我的問題。這也許可以解釋我何以沒有利用秦簡寫出法制史的論文。

現在回頭看自己在《史原》發表的論文，我仍不後悔。那兩篇文章也許有不少個別錯誤，部分解釋難免牽強，但即使以今天的研究水平評估，它們仍有高度的原創性。梁其姿教授（中央研究院院士）是研究中國癲瘋病的權威，她在中國癲瘋病史的論文中，也引用我的作品，可見在研究議題的選擇上，這兩篇二十多年前的舊作有其原創性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。對我個人而言，它們也有特別的意義。這兩篇文章不但處理醫療、疾病、宗教、巫術等主題，還將討論範圍延伸至社會層面。甚至可以說，這兩篇文章奠定了我往後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，即宗教史與醫療史，尤其是二者的交集。

思考《史原》的發展走向

在情感上，我當然很認同《史原》，畢竟我早期最重要的論文就是發表在《史原》。另外，研究生在學時，如能從事編務

工作，可以較早知道學術期刊運作的流程，如體例、邀稿、審稿、編排等，是很好的訓練。但考慮到現實面，我必須很坦白的說，對於我指導的學生，我不會積極鼓勵他參與編輯，也不會鼓勵他投稿《史原》。

我在審查、評鑑研究與教學成果方面，算是頗有經驗。現在各大學和研究單位要用人，會有些形式條件，這是青年學者必須考慮的。依現在的審查程序，除非學、經歷傲人，或是審查者熟知你的來歷與功力，否則，即使你有10篇《史原》的論文，很可能會輸給只有在《新史學》發表3篇文章的競爭者。困難的地方在於，如果應徵的單位沒有熟悉你領域的學者，亦即沒有能真正欣賞你作品的人，論文寫得再好，評審者也無法確定你的學術能力。一般而言，審查者如果不熟悉你的領域，大多是透過你投稿的期刊級別來判斷你的作品層級。這便是目前期刊排序制度所以能存在或發揮作用的緣由。期刊排序反映的是一種品牌的概念。期刊的口碑是心理和經驗的累積，如同學歷一樣，需經過競爭、淘汰才能成形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。

我必須坦白的說，《史原》或一些青年學者合力創刊的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固然提供研究者發表的園地，但這可能反過來為年輕學者找工作、升等帶來未必正面的影響。有人充滿自信與理想，知難仍進，我當然敬佩與祝福。事實上，沒有進入期刊排序，不必然表示期刊水平不如人。但是，我仍想強調，考慮到現實問題，我不會鼓勵親近的人把心思花在這上面。



那麼《史原》該不該加入期刊評等的排序呢？首先應該思考的是，《史原》定位為研究生刊物，但為什麼研究生一定要自己辦一個刊物呢？今天若想發表文章，並不缺園地。若把自己設定成研究生刊物，起頭便矮人一截。而且研究生是流動的，缺乏一個真正特定的機構支持。就以《新史學》來做比較，其成員流動性夠高了，但至少還有社員大會，而且社員大多已在所服務的機構有專職工作。而研究生畢業後，便失去其原有身分和依附的機構，除非系所願意長期支持，否則研究生刊物很難壯大與發展。至於要不要加入評比，主要是看期刊單位有何打算，如欲申請補助，自然需要加入排序。如不缺經費，則不一定需要。史語所的《古今論衡》似乎就沒有加入排序。這是因為期刊評比有些形式要件，太過標準化，而有些期刊、雜誌就是要讓作者有更大的自由度，只要言之有物，都能採用刊登，而這一類的刊物便不宜、也不必參加排序。

若真要持續經營，那麼，《史原》應避免成為特定學術社群的投稿園地。《新史學》當年創辦的一個重要理由是，杜正勝先生認為當時臺灣歷史學的刊物太多了！但數量還不是最大問題，而是各校有各校的期刊，演變成同仁刊物，不同單位的研究者不通聲氣。同時，由於稿源有限，多數刊物無法準時出刊。當時，杜先生認為臺灣歷史學界應打破門戶之見和學校藩籬，辦一個新的、開放的、有嚴格審查制度的刊物。而為避免長期之後又變成被壟斷的封閉性刊物，《新史學》規定主編任期一年，且不得連任，編輯

委員中只有一人留任，以銜接編務。五位編委也絕不集中在某一個單位，這是希望能不斷引進新血，以用人的多樣性來打破壟斷。

《新史學》從無到有，主要是杜先生在奔走、籌劃、召集與定調。我想，即使杜先生想要長期做主編，創刊的社員應該也不會有反對。但杜先生沒有這麼做，因為打從一開始，開放門戶、不斷換血便是《新史學》的核心價值。

現在的歷史學期刊還是相當多。一個理想的目標是，在嚴格、合理的評審、評比後，臺灣最終留下少部分品質較高的刊物，它們是哪些單位發行的沒有關係，重點是園地要開放。而在選出幾份綜合性的優良期刊後，還可以再細分門類，如西洋史、臺灣史、史學理論等，按次領域評等。作者則可按照文章性質，投稿到相關領域的優質期刊。由於現在採雙匿名審查，無論是學者、教授或研究生，甚至是業餘的研究者，都可以投稿，研究生的論文不是只能投研究生刊物。未來《史原》的發展走向，不妨把上述意見納入考量，最重要的是，要確保園地開放和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審查制度。

辦《史原》可以訓練編輯實務，也能建立研究生的歸屬感與認同感，這是事實。但現在許多期刊都提供研究生參與編輯工作的機會，如《新史學》、《臺大歷史學報》等，未必需要投入新期刊（這就《史原》是「復刊」而言）。關於認同，我認為在數位時代，有必要反思社群、認同等概念。今天大家想發表、交流意見，透過部落格、臉書（Facebook）等，可以有效率又成本低廉的



《史原》憶往——林富士教授學思訪談

達到目的，且能見度無遠弗屆，讀者更多。

我對辦期刊持保留態度的另一原因，是上面談到的成本問題。在數位化的趨勢下，有些雜誌已減少印量，甚至不再印紙本。編輯期刊，會產生編務、紙本庫存等負擔，個人如此，機構、單位也是如此。如果能妥善利用網路等電子資源，便能大大地節省成本。以上想法，參與《史原》編務的同學可以考慮。

勉勵青年學子

科技引領社會進入了數位時代，我們的思維也必須進入數位時代。我認識到數位科技對人文研究有很大的衝擊和便利性，便親自去嘗試，早年即參與了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的建置，後來也投入數位典藏計畫。我在史語所徵聘助理時，都希望可以照顧到文科的學生。但我發現文科學生的電腦、軟體、攝影等技術大多不熟練，甚至缺乏基本概念，最後仍然只能錄用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。有鑑於此，我在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任內，便開設了與數位科技技能、數位典藏與數位創作等相關的課程。我也在那裡創設電視臺、電影工作坊、寫作班等。我的想法是，我們可以自己訓練出符合期待與需求的學生。培養學生擁有這些技能，不只對我個人執行計畫有幫助，也是為了讓他們自身擁有一份珍貴的資產。數位時代，大家亦應具備一些新思維，如關於「發表」與「社群」的觀念，前面已提過了，不再重複。

在讀書、做研究的同時，大家也應該不斷反省，自己到底在做些什麼事？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是不斷挖掘被遺忘、被掩蓋的過



▲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任內創立「鹿鳴文化資產中心」，圖為接受訪問的照片（2009年7月9日攝於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室，圖片來源：中興大學文學院電子報）。

去，再娓娓敘述「故事」的始末。但我有時候會覺得，這種挖掘其實無窮無盡，且常常會產生有何「功用」的困惑。當然，在閱讀和探索的過程中，我非常快樂，精神上感到很充實。不過，有用、無用的困惑還是會產生，我還是必須做一些調適。因此，我經常寫隨筆，記錄自己的心情。同時，我會要求自己做一些立即而有實質效果的事。

這一自我要求也許跟家父有關。在農村社會中，我父親算是仕紳，他識字、做生意，也從事公共服務。我們是大家庭，他常承擔比較大的責任，為家族成員、村民排難解紛。耳濡目染，我也覺得這種事很有意義。直接投入公眾事務、幫助他人，對我來說很有價值。例如，我大學時做學會會長，辦刊物和學術活動，就是對現實世界不盡滿意，希望有所改進。《新史學》創辦時，我是最「菜鳥」的成員（時為助理研究員），從刊物命名到撰稿格式、稿約的擬訂，甚至信封、信紙的設計等細節都參與了。雖然大費工夫，但我覺得甚有意義。後來，我參加一些計畫和兼任行政工作，也是抱持這個心



學人專訪

態。我做這些事情，是因為有人需要，也是因為現實世界的不完善。例如，我做學術、教育行政主管，是因為對當今的一些制度不滿意，我必須擁有職位與權力，才能進行實質的改革，也才能對社會有立即性的貢獻。我在象牙塔裡從事研究工作之外，有時會不務正業，主要就是要均衡自己的生命發展。除了個人研究上的愉悅與充實，我總要求自己多做點什麼，可以離開自己的書堆，對別人有實際的幫助。當然，從事這些工作很花時間，甚至會影響身心健康。但面對充滿缺失的事物或世界時，視若無睹、或袖手旁觀，或是怨天尤人，絕不是我的風格。我也相信，人類整體是一個生命共同體，悲喜同調，休戚與共，想獨善其身或置身事外者，到最後還是難逃「共業」之報。

不過，在研究生階段，好好讀書、做研究仍是最首要的工作。前面提到我對於投稿《史原》的一些擔憂，並不是說我反對研究生投稿。相反地，我認為投稿是一個很好的訓練。期刊排序的若干問題固然令人詬病，但仍有其客觀性。例如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若投稿能進入正式審查階段，無論最後刊登與否，我相信投稿者大多會心存感謝。因為即便被退稿，作者所收到的審查意見往往非常豐富，審查人閱讀之仔細與提供建議之質量，往往比指導教授改學生論文還用心！這是因為審查人必須同時說服作者和編委會，而這些資料最後都會作為評等、排序的依據。所以期刊排序有其合理性，要成為優良刊物，並不容易。另外，重要刊物往往可以請到更專業的學者來評

審稿件，這也是一個優勢。所以我鼓勵研究生，如有真正下工夫、用心撰寫的文章，可以嘗試投稿到重量級期刊，不要怕被退稿。任何人都可能被退稿，而且，不一定錯在作者，學生更不必有此心理負擔！

當研究生，有時難免苦悶，或是擔憂未來的生計問題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只能很簡單地說：不要想太多！我當年也擔心過工作問題，所以有到《聯合文學》應徵的事。我的經驗和建議是，即使有時感到茫然，也不要因此而什麼都不做；只要降低物慾，維生似乎還不是那麼困難。如果找到一個你覺得很棒、很喜歡的題目，指導老師也能認可，不妨就全心投入其中，你會感到很充實，很有自信，很快樂。只要用心、拼命，就算未來不繼續待在這個圈子，研究生階段的經驗依然會是你一輩子的珍貴記憶。當然，上述的一切，都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作基礎，這一點也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輕心。



▲以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身分頒發榮譽博士給齊邦媛教授（2009年10月31日）。林老師在研究所時期（1984）曾修習齊邦媛教授的「高級英文」課程。